

天鹅的故事



文/社会学与人类学院 邓启耀

我们对“禽兽”有一种偏见,以为它们没有感情、意识和灵魂,甚至认为它们不过就是“菜”。在以人为中心,其实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中,我们习惯了一种残酷的生活和生活态度。

1981 年 2 月
今年的春节,我们将在泸沽湖一带过。
摩梭人在年三十晚上也守岁。如果谁熬不住了,老人就要讲一个故事:

在一切不死不生的创世时代,人兽杂处,人和万物没有寿限,到处是老人老事物,活得无聊。天神觉得这样不行,决定给天下万物定寿岁。他选择年终的最后一天夜里,在新年来到时按应答先后“给命”。

我们摩梭人的祖先贪睡,没有守岁。所以,天神爷叫一千岁时,他没听见,夜行的雁鹅(天鹅)“啊!哦”应了一声,这一千岁就被雁鹅得去了。天神爷又叫一百岁,黄鸭应了,黄鸭便可以活一百岁;天神爷叫六十岁,狗应了……这样一直喊下去,天神爷叫到十三岁,这贪睡的祖先才迷迷糊糊哼了一声。人醒来,很懊悔,就去找其他动物换寿岁,但都不愿换。后来,狗可怜人,答应换。天神嘱咐人:“狗的寿命换给了人,从今以后,人不能用脚踢狗,大年三十晚上吃年夜饭时,首先要给狗敬饭。记住,你们人啊,一定要这样报答狗。”

听着这个故事的时候,泸沽湖有雁鹅、鹤和黄鸭飞过,叫声在空旷的天和湖之间回荡,显得十分遥远。

后来我和几位同学步行环绕泸沽湖走了一圈,走到东岸的草海时,看到离我们 200 多米的水面上,免满了水鸟。黄的是黄鸭,灰黑的是鹤,白的是天鹅、白鹤和丹顶鹤,还有许多叫不出名的鸟儿,在草海和湿地沼泽中悠然飘浮。风吹起一排排浪,轻一点的水鸟随波起伏,不知不觉被波浪推向岸边。于是,稍有谁感到不安了,便呼啦啦带起一群,飞到离岸 200 米的地方落下。再被浪推过来,再飞回安全线内。如此循环往复,甚是有趣。

天鹅没有那么忙乱。它们优雅地浮在水面,不靠近岸边,也不躲躲闪闪,一副定力很好的样子。洁净的白色轮廓地凸现在澄蓝的湖水里,吸引了所有的目光。

那次与天鹅相见,我在岸上,它在湖中,我们相望了很久,都没打破各自的宁静。

在环湖步行考察的那些日子,每逢晴夜,我总喜欢躺在独木舟里,等待天鹅从月亮旁边飞过,那是小时候看童话电影忘不了的镜头。天鹅果然是凌晨叫得最早的飞鸟,我觉得它是和神话、和音乐、和诗同生同灭的精灵。

如今已很少有人谈诗、谈神话,谈那些千百年不变的东西了。街上流行各种与时俱进的口号,流行卡拉 OK 或时髦的东西,飞快地流行,过时,此伏彼起。因为人类贪饕的枪声和万物之长的自大,我们已经开始变得日中无物。也许只有摩梭人还认为人不如狗,不如天鹅,更没有谁可以“万岁”,所以每到新年旧岁交替时要为 13 岁的娃娃举行换装仪式,庆祝新生;同时向狗叩头,崇拜天鹅,让他们知道人类并非老大。

1996 年底
我的摩梭朋友拉木·嘎吐萨讲了一个关于泸沽湖的故事:

有一个摩梭猎手在湖边看见两只白天鹅,开枪打死一只。他背着这只天鹅回家,发现有一个白影跟踪在后面,那是另一只天鹅。它一边叫一边在他头顶盘旋。他想开枪,它便飞远,但始终不离开,一直跟到他进屋。猎人想,它看不到人就会飞去吧。可是,等他吃完饭一出门,它竟在房子外叫开了,飞来飞去地叫。开枪,它飞开,一会儿又回来了。连着三个晚上,它都在叫,叫得全家人心神不安。

第三天早上,终于安静了。猎人的母亲早起出门去抱柴烧火,突然叫着跑回屋里。全家出去一看:那只天鹅活活撞死在他家木楞房前,眼睛睁得大大的。大家都很怕,念经祈祷。从此后,这个猎人不再碰猎枪,不再杀生。(见右下图:挂在墙上的猎枪、马铃和猎手的帽子。它们和过时的日历一样,已经成为往事。)

这时正是深夜,万籁俱寂,但那个声音一直在我心里盘旋,久久不去。天鹅死了,死得让猎人颤抖,也死得让我震撼——我为自己多年来没听懂过它们的叫声而羞愧。其实在很长时间里,我们对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生灵,都是完全陌生的甚至漠然的。我们对“禽兽”有一种偏见,以为它们没有感情、意识和灵魂,甚至认为它们不过就是“菜”。在以人为中心,其实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中,我们习惯了一种残酷的生活和生活态度。

高原的夜幕空寂无字,但我记得天鹅的叫声。它发自湖心,空得像从星河间传来,却又清晰得如湖水般浸透到心底。摩梭人想象天鹅是活得最长的圣鸟,因为它每年都是那样准时地来到泸沽湖,一千年没失过约。

如今泸沽湖还有没有天鹅飞来,我不敢问。

2000 年 7 月

在喇应祥老人的楼院前看湖是一种享受。我和老人慢慢地喝着茶,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湖滩上没有一个人。我忽然有一种似曾相识又很陌生的感觉。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到这里。”我说,“从西岸落水那边走,沿南岸,转到东岸,再经北岸到宁宁,用一个星期慢慢悠悠步行绕了一圈。记得那时这一带有很大一片草海,有很多鸟,连天鹅都见得到。怎么那地方现在好像找不到,不像了?”

“你说的这地方叫‘尔底’,意思是看白鹤的地方。”老人说,“我们这儿有个草海,连着泸沽湖。草很深,一人多高,根串着根,水在下面流。藏在草根里的什么都有,菱角、蛙、蛇、螺、虾,还有水獭和獭……菱角一年不割就长满湖,天鹅最爱吃;有一种叫香胡子的东西,可以做草药,小时候我们用火烤来吃,很好吃,丹顶鹤也最喜欢吃它;用虾子烧酸菜汤,下锅前揉一下,很香,所以叫香虾。香虾拉到盐源卖,好卖得不得了。当地有民谣说:‘左所草海好地方,菱角肥把虾子汤’。每年冬天,这儿的草海会飞来成千上万的鸟,有丹顶鹤、黑颈鹤,有天鹅,白的黑的都有,还有大雁、黑鹇、黄鸭等。它们晚上到草海里吃草、菱角、捉螺和香虾。草海里野鸭的种类很多,过去五月底午钻草棵捏鸭蛋,一两个钟头就可以捡到一筐筐。但我们是从来不打鸟的,老人不许打。小时候不懂事,做了弹弓偷偷去打鸟,大人知道了就要骂:‘不要作孽!人家还是一条命。’我们从不吃蛇、蛙和水牛,因为在老古辈的传说里,它们都有不得了的故事;我们更不会吃天鹅这样美丽的生物。这些鸟很有灵性,我们祖祖辈辈都把它们当神鸟,没有谁敢打一只。谁真打了,全村人就要把他家的肥猪牵一头来大家吃,让他算一算,是天鹅丹顶鹤的肉多,还是自家猪肉的肉多。他损失的比得到的多,就不敢再打了。”

“文化大革命破除唯心论,不信神,更不把鸟兽放在眼里。为了搞阶级斗争,民兵都发了枪。斗过人,就打鸟。用棒棒打到岸边打,用草乌拌上吃的闹(毒),用机枪扫,扫得水面都漂白了。有一年,说有狼躲在草海里,就放了一把火,万亩草海烧得面目全非。”

“这以后,鸟儿就不大来了。这当然还有一个原因,由于人口增长,地不够种,就围湖造田,把草海的草烧了,地翻过来,种上庄稼。鸟儿找不到原有的食物,自然不再来了。”

原来,我眼前那些平庸的庄稼地,就是往昔的百鸟乐园呀!

2002 年 2 月

深夜,惯常的旅游节目早已结束,村民和游客回到各自的地方。也许有人会做一些出格的梦,但不会有人知道,也没人在意。

我独自到湖边散步,只想在没有灯光的地方看看星星,听听湖水拍打独木舟的声音。

我躺进一条独木舟,把头从船上倒垂下来,贴近水面。湖面和大地弯曲出弧形,托起一个圆圆的星空。我想起“苍穹”这个意象,一定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出现和感知的。星星大而且明亮,离我很近。水拍木舟的节拍,就在耳边,好像又很遥远。它让我不由自主想起一些神话,体悟到一种神秘空灵的感觉。

突然我依稀听到几声鸟鸣,远远地穿透了夜空,在圆形的天宇和湖面一滑而过。它们的叫声有一种让人心灵稳定的力量。

第二天清晨,我从湖边路过,不经意间往湖中一看,忽然发现 200 米开外的湖面上,飘浮着许多鸟儿,有黄的,有黑的,有花的,一群群各自浮在一起。先以为它们是家禽,待哗啦一下飞起来,才明白是野生的。更远的地方有白的,看不清是不是天鹅。

“这些鸟,早就来了。”牵马的摩梭姑娘告诉我,“现在管得紧,不管是哪个,都不许打。”

这么说来,我昨天晚上听到的那一声鸟鸣,不是“空穴来风”了。

这真是个好兆头!虽然还没有看到天鹅,但我突然觉得心满意足了。也许,最重要的是,在泸沽湖,我看到对天鹅以及各种生命的谋杀,不再合法。



思维如水流下沙堆

文/现代教育技术与研究所 王竹立

如果在一个沙堆上倒一杯水,你知道水会往哪几个方向流吗?大概不能。

但如果再让你在原处倒第二杯水呢?你基本可以确定水流的方向了。如果水的冲力不是太大,水一般会顺着第一杯水冲出的方向继续向前,把原来的痕迹延长和扩宽。

你还可以发现另一个现象:如果一杯水只冲出了一条小沟,那么它可以流得较远较深;假如它冲出的小沟越多,那它就走不远,很快就被沙子吸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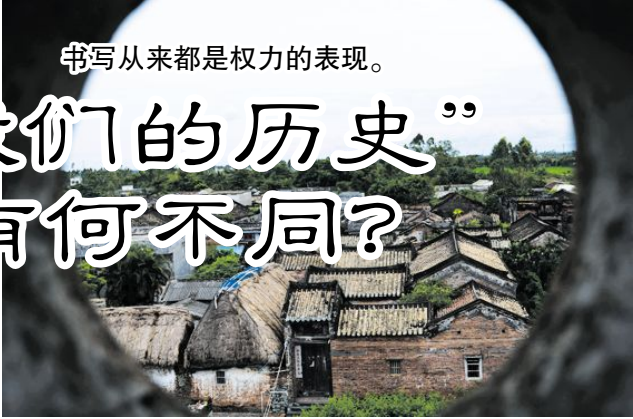
这就像人的思维。

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大脑还像没有被倒过水的

沙堆,随着知识和经验的增多,慢慢地在头脑中就形成了若干条不同方向的水沟,以后这些水沟会不断被加深加宽,形成了每一个人的思维定势。年岁越大,这种定势就越不容易改变,我们的创造力就越来越少。除非有强大的内外冲力,我们的思维一般不容易跳出既定的路线。

但每个人的思维又是不同的,就像沙堆最初的形态会对水流的方向造成影响一样,每个人大脑的先天结构也会产生不同的思维习惯。有的人思维缓慢而深刻,但容易“一根筋”;有的人思维灵活而跳跃,但又可能流于肤浅,不容易成型。

之所以想到这些,是因为我对两个学生的观察。一个做事认真,刻苦努力,但比较固执,不易接



文/历史系 徐 坚

中国不缺乏“历史”,但过去的“历史”好像缺少了什么。对,缺少了“我们”!——不是帝王将相,高高在上的大人物的历史,就是“代表”着“我们”的人们的历史。“我们”不过是轰轰烈烈的大事的受体和背景,是英雄个人的分母,是用复数形态描述的默默无闻的普罗大众。我们习惯通过宏观叙事的“历史”学习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但是“大历史”如何和我们的“小生活”联系在一起?“吾国吾民”如何和“本乡本土”结合起来?我们可能熟悉万里长城,却认不出旧村边缘防御土匪的寨墙,我们对从未见过的藩篱纸如数家珍,却完全不知道父辈们年少时还在使用的土法草纸。那些熟悉的“历史”属于教科书,可以习得,却无从感受,更无法激发对乡土乃至家国之爱的。于是我们提出另一种历史的观察和写作——“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历史?它是一个着眼于“本乡本土”的村史项目。村史项目志在表达世代生活在特定聚落之中普罗大众的历史记忆,通过搜集乡村档案、开展乡土考古学、建设社区博物馆达到村史写作和讲述的目的,但是,这只是村史计划的一部分,我们的理想更为高远:村史不是被供奉的庙堂历史,而是活生生地存在大树下,水井边的草根历史,它是乡土身份建构,乡土知识教育的最好原材料。

“村”是什么?这只是一个习惯称法。在我们的视界里,有人群处就有斗争和妥协,就有反映斗争和妥协的历史记忆,就有围绕着历史记忆的沟通和争拗,就有了写作村史的必要。村指社区,或者聚落。它可能比“村”更小,也可能比“村”大;一个传统的自然村落是预置的村史写作单位,但是,几个相邻的自然村,因为某些因素而融合为一体,当然可以构成另一种村史。三五户人家的荒郊,如果他们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认知,自觉和周遭的其他人家不是一路,也一样具有村史写作的资格。历史上形成的各种集镇,其规模往往是一字型大道两侧附着纵向街巷,也在村史写作的可控范围。“村”可能如你所想像,也可能和你的预期截然不同。村史计划将包括很多传统村落,拥有各级“历史文化名村”头衔的村落常常比其他村落有更强烈的撰史意愿,它们常常保留了更好的民居建筑和景观,可能拥有历史名人或者名姓,可能拥有传统手工业手造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点,村中耆老可能更为配合,甚至乐于诱导,但是村史计划从不排斥任何乏善可陈的“贫村”,事实上,我们从来不认为有任何村落不配写作村史,我们需要释放那种在国家视角历史下形成的乡土自卑。

村史计划的写史倾向从来不是愈愈愈好,我们的批判史学训练告诉我们,很多古老的历史并不可靠,可靠的反倒是古代历史的制造,这样,古村和贫村的区别就只剩下制造术和心态的差异了。正是基于对“本乡本土”的历史,而不是“吾国吾民”的历史的关怀,我们不会格外垂青任何“祖庭”、“源地”或者“中心”,那些在传统史观下自惭形秽的村落反而是我们更加珍惜的。我们不关心村落是否具有全国性或者区域性价值,相反,我们关心的是土著住民认定自家村落有何与众不同。如果历史只是一种记忆术和阐释法的话,我们就不会以年代原因排斥任何年轻的村落。我们有兴趣了解像石门坎一因为天主教的传入而形成的新社区、也有兴趣观察珠江三角洲一带九十年代以来形成,被当成城市的恶瘤,藏污纳垢的城中村。虽然大多数村落的记忆至少摆出积极、健康、向上的姿态,但我们从不会拒绝村落的“伤痕”记忆。”

那么,“本乡本土”历史是不是“吾国吾民”历史的延伸?是不是写作“大历史”的学者们忙里偷闲,放低身段,也能写出“小历史”?不,我们的村史计划是传统历史写作中永远无法实现的。村史写作不是自上而下推广的填补空白工作,而是一种全新的写作态势。书写从来都是权力的表现。历史上,无论是书写能力还是书写条件,书写都预置性地和自上而下的大历史结合在一起。当这种写法偶尔屈尊到村庄层级时,仍然采用了高高在上的俯览屈就态度,他们所描述的乡土生活和真正生活在乡土之上的人们的生活经验相去甚远。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听听乡土住民如何认识?如果文字和书写是障碍的话,为什么不选择其他的记录方法?村史的书写方式不是唯一的,因此阅读和记录方式也不再唯一。而且,“正史”式写作缺位,在地“关键讲述人”的出现,反而有助于村史对庙堂史学的反文一击。

村史怎么写?我们并不是村史写作的学者,因为村史早已写就,我们只是帮助它更流畅而系统地表述出来。虽然大部分村落没有成文的“村史”——如果侥幸有,也多不是我们所期待的,但是任何村落都不缺乏读书人和文字,村公所里会有户籍登记和大事记录,祠堂里有开祠、设界、租田、纠纷和功德碑刻,家中有族谱、地契和各种法律文书。还不止这些,村里小卖部外,寺庙门口,甚至卫生所墙面上,可能保留了信息量极其丰富的文字材料。村中可能会有一位退休小学教师,或者老村主任,或者年老返乡的本村“公家人”正在写作他心目中的村史。他就是我们的“关键讲述人”,甚至可能是“合作作者”!关键讲述人会引导我们重新梳理这个村落的文献和口承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口承文本保留了比书写文本更多的历史写作素材。村中耆老一般都乐于向外推介自己的村落。虽然常见的是正儿八经地如“答记者问”般地讲本村光荣史,但是更有建构价值的可能是一段荒诞不经的“讲古”,一则取笑周边其他村落居民的低俗笑话,一首不登大雅之堂的小曲。除去书写文本和口承文本,村落也将历史书写在物质文化上。村中寻常家庭从厨房到客厅的器用文化,一针一线一粥一饭的来历总是人地关系和经济生活的最佳写照,家庭内房间分配,多组住房如何围合,村中不同姓氏的宅基分布都是社会生活和权力结构的直观再现,家中神位如何供奉,家族坟莹分布何处,何时去村中神庙拜拜无不是精神和信仰的记录。

“我们的历史!”就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草根写作,让早已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文本写出来的村史以文字的形象显影出来,让曾经被剥夺了发声权力的住民重新获得对自身历史的阐释权力。学者只能居于辅助、引导和发现的地位,“让住民的归于住民,学者的归于学者”。这个显影过程有文字还不够,我们还需要用图像、物质显影,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博物馆。住民自己选择、建构和阐释的社区博物馆事实上就是遗产传习所,就是乡土文化中心,就是乡土教育中心,这样,我们的村史计划将沿着乡土教育和乡土建设之路走下去,可以走得很远很远。

受别人的意见,尤其当自己对某事花了不少心血之后,就容易形成定见,不大愿意变通。但一旦想通了,他的进步又往往比别人要快;另一个则思维完全没有固定的方向,你问他问题,很难预计他会如何回答,而且他的回答常常让你觉得答非所问,喜欢逆向思维,在创造力测评的时候曾得到过高分,但在工作和学习中却很少拿出具体的成果,也没有发现他有比较系统的想法。

如果你希望思维走得远,最好专注于一个或少数几个方向;如果你希望突破思维定势,最好打破常规的路径。有时自己也不易发现自己的思维定势在哪,这时就需要借助外力的冲击了,也就是需要来一记“当头棒喝”。

无国界医生(MSF)是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自 1971 年成立以来,MSF 一直为受到武装冲突、疫症和天灾影响,或被排拒在医疗体系以外的人群提供无偿医疗人道救援。

2013 年 4 月到 6 月,在家人的支持下,通过几轮面试和严格考核,我远赴阿富汗昆都士省的 MSF 创伤医院,从事临床麻醉工作,救治当地创伤患者。

由于阿富汗长年经历战乱,该国瘫痪的医疗系统完全无法提供正常的医疗服务,贫穷的患者,往往只能在无助中等待死亡。据统计,阿富汗人的平均寿命只有 42.9 岁,处世界最低水平。“无国界医生”在阿富汗北部昆都士设立了一所外科创伤医院,专门免费收治战伤和各种创伤患者。医院一共来自 18 个国家的 23 名国际救援人员和

在阿富汗当“无国界医生”

文/孙逸仙纪念医院麻醉科 赵一凡

所谓的人道精神,并非以什么济困扶危的伟大医生或者慈善家自居,而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对苦难中的人们的遭遇感同身受,想其所想,竭力相助。

150 名本地医护人员组成,一年能为上千名创伤患者提供无偿医疗服务。

2013 年 4 月 6 日下午,经过 4 天的颠簸,我辗转到达了阿富汗昆都士省。虽然这是城市中心地区,破败的建筑,无序的交通,衣衫褴褛的行人,高度紧张的武装戒备,都在告诉我这是一个饱经战争摧残的国家。记得在 2004 年 6 月,在阿富汗项目工作的 5 名 MSF 救援人员在蓄意袭击中被杀害,导致 MSF 被迫撤离,直到 2010 年才恢复在该国的救援行动。

刚进医院,我就参加了关于如何接诊多名重症伤员的会议,并会诊了一个脑外伤患者。下午 5 点,得知我已经整天没吃没喝了,一位本地年轻医生马上跑出医院,帮我买了水和饼干。我想等他钱时,他微笑着摇摇头,右手按在胸前说:“Don’t worry, here is Afghanistan!”他那种以身为阿富汗人而自豪的表情,我至今仍历历在目。我想,我来这里不是以一个“援助者”自居的,而是要感受他们的感受,和他们一起对抗疾病与创伤!

晚上我刚整理完行李,没想到紧急任务来了。“枪伤,紧急腹部探查!”一位中年女性,左腰部中枪,子弹从脐旁穿出,左肾碎裂,结肠回肠穿孔大出血!这是我第一次为枪伤患者进行麻醉手术,也是第一次在“联合国”般的医疗团队里工作!快速气管插管全身麻醉、抗休克治疗、输血……用的是中国九十年代就淘汰的麻醉药物和设备,听的是各种不同口音的英语。3 个小时后,手术成功,女患者如从梦中醒来般问道:“手术做了吗?”

这里几乎每天都有枪伤、炸弹伤或车祸患者,我习惯了直接在急诊科抢救危重患者然后护送有存活机会的进手术室接受手术。作为医生,我从未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在战火纷飞的国度下,生命如此脆弱!

一天,医院来了一位 2 岁小女孩,她乘坐的三轮摩托翻车,造成上下颌骨骨折,右嘴角撕裂达颧骨,伤口血流不止,状况惨不忍睹!对普外科医生来说,进行口内手术已是很难得,而对麻醉医生来说,施行麻醉就更困难了。因为上下颌骨骨折容易造成气管插管困难,另外一进入麻醉状态,口内出血就可能流入气管导致窒息甚至死亡;然而不麻醉无法手术!

我在孙逸仙纪念医院工作多年,对口腔头颈外科手术麻醉有丰富经验。对这位女孩,我采用了快速麻醉诱导技术,在 1 分钟内使病人入睡,呼吸停止,止血纱布移开的 10 秒内,经鼻腔气管插管成功。若此过程稍微延迟,患者立刻会发生窒息!这种麻醉处理,使病人在无痛无意识和牙关松弛的情况下接受手术;经鼻气管插管将口腔完全留给了外科进行手术而不必担心血液流入气管。90 分钟后,手术顺利完成,骨折被成功固定,口角的撕裂被完美缝合,女孩舒适苏醒,气管插管移除。手术成功了,我们互相祝贺和感谢。从此,我得到同事们高度的信任,但凡有危重病人,经常都请我去会诊。在阿富汗工作的两个月时间里,我们这个“联合国”手术团队一共完成了五百多例手术,拯救了许多重伤垂死的患者。

在昆都士医院的手术室里,我见到好几个令人心痛的病例:一位二十岁女孩,身材极为瘦小,因为一些小事触怒了父亲,被父亲用木棍把双手尺桡骨掌骨全打折了!一位两岁的小病人,从车上摔下导致右手腕骨折,父母无暇看顾,直到骨折开始畸形愈合才来就诊,当我们检查时,发现她的小手已经严重肿胀和畸形。一位长得像洋娃娃一样可爱的五岁女孩,玩耍时左脚意外被哥哥用铁铲铲断了三个脚趾,我见到她时,她独自躺在准备间,无人陪伴,不哭也不笑的她,在我向她挥手时,却还懂伸出手和我相握……

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叫巴斯敏娜(化名)的 8 岁女孩。她跟随家人参加一个婚礼,突然遭遇两派势力枪战。巴斯敏娜被流弹击中,子弹竟然划开整个腹壁,所有肠子都流出来了!送到医院后,首次手术在我们的一番努力下暂时挽救了她的生命。我曾经非常高兴地看见她术后第二天在 ICU 里微笑着看漫画书!但是,由于我们缺乏白蛋白、脂肪乳等静脉营养,她的肠道创口完全无法愈合,更不能进食。经过后来的 3 次肠瘘修补手术,她变成了真正的“皮包骨”。在我任务结束离开昆都士的第三天,她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作为一个医生,对各种手术或许已经司空见惯;但作为一个父亲,见到这一幕幕,实在令我难以释怀!所谓的人道精神,并非以什么济困扶危的伟大医生或者慈善家自居,而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对苦难中的人们的遭遇感同身受,想其所想,竭力相助。或许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人间有真爱!